

党啊，我把生命交给你

——我们的父亲尚嘉齐

○伍曙 尚钢 尚涛



1962年尚嘉齐学长全家福。前排左起：夫人伍骅、伯母王瑞华、尚涛、尚嘉齐；后排左起：尚钢、伍曙

我们的父亲尚嘉齐，1924年5月6日生于河南省罗山县。

我们的爷爷名尚钺，河南罗山县人。中学生时积极投身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肄业，并随鲁迅学习文学创作，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接受李大钊的思想影响和具体指导，于1927年南下投身国民革命。同年9月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赴豫南发动罗山、光山等县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到上海、东北等地为中共做地下工作。1932年他在中共满洲省委任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工作，后按党的指示去云南大学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并担任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主研中国古代史，是中国历史学家。

我们的奶奶名陈幼清，读过私塾和夜校，结婚后受爷爷的进步思想影响，连同陈子和、陈镜吾两个弟弟都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由爷爷等创建的以“唤醒民众，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青年学社”。大革命时期她曾经积极参加县妇女会的工作，被选为罗山县苏维埃妇救会主任、中共罗山县委委员兼苏区被服厂负责人，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解放罗山县城时，她公开出面参与组织欢迎红军入城。由于暴露了身份就随红军撤退到苏区工作去了。

根据资料记载，她于1932年在苏区牺牲。当时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肃反，罗山县的县、区、乡苏维埃干部都被召集到宣化“整训”，严刑逼供，把包括工委书记郑新民、副团长全范文、区委书记陈子和在内的参加“整训”的80%以上的人以“改组派”的罪名秘密处死。奶奶被处决时，在场群众苦苦哀求，结果他们无动于衷。倒是同被关押的两个孩子被抱了出来，一个是4岁的叔叔尚海伦，后来不知

下落，另一个是11岁后来对父亲颇具影响的伯父尚嘉芝。

在苏区大革命期间，父亲虽然年龄小，仍然受到很多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头脑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知道了在我们国家里还有另一种社会，在那里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过着非常艰苦的战斗生活，干的是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和造福广大人民的事情。父亲从苏区回来虽然还只是个儿童，但也曾受到过白色恐怖的压力。刚回来时的一两个月，家里不许外出，怕被人知道了要“提去杀头”，后来外出了也总被别人歧视，以“小共产党”为由加以辱骂和嘲笑。而且精神上是受压抑的，连跟街上邻居的孩子游戏的时候也不敢得罪别人，受了欺侮只能忍受。

1933年8月伯父尚嘉芝由苏区回来了，他因为比父亲大四岁在苏区已经当红小鬼了，这次回来是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家里用钱赎回来的。由于伯父的坚决要求，1934年春他们一同又重新返回小学学习，这些给父亲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伯父年纪虽也不大，但已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许多进步的报刊，在小学校他每逢革命纪念日就偷偷地写些标语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伯父还经常给父亲讲他从新的杂志和书籍看到的道理，使年幼的父亲开始知道什么是剥削压迫，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百姓这样才能改变受苦受难的命运。

在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遇到两个思想进步的好教师，一个叫李寿民，是伯父的老师，他经常在学生集会上宣传抗日的道理；另一个叫雷敬宗，是父亲的级任教师，对父亲非常爱护。伯父在校时是学校图书馆的馆长，他走后就由父亲继任了。

在这时期父亲读了不少书，由于伯父在通信中的帮助，教师的引导和图书馆的便利条件，父亲在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和六年级上学期就开始读宣传革命的《大众生活》《读书生活》等杂志和通俗的社会科学读物，最先读的社会科学读本是世界知识社出版的《世界知识读本》和曹伯韩著的《通俗社会科学廿讲》。当时虽然年龄还小看不太懂，但许多基本概念如：在社会上有两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等却在他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在抗战国共合作时期，爷爷回到罗山。同年夏天，爷爷把父亲由罗山接出，到了四川万县。后来父亲在万县生活书店做了两个半月的店员。当时到生活书店工作主要是因为生活书店是个进步书店，书店负责人也是进步分子，在这里可以学习，其次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有困难，念不起中学。在生活书店，父亲看了不少进步书籍。

1938年，爷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在该部担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工作内容是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初，爷爷已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撤退到重庆了。爷爷把父亲送进了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是1937年9月3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在上海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少年儿童的组织。由于战争形势变化，由党组织带到武汉，改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后又到桂林，转至重庆。

父亲在这个团体生活了整整三年，这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三年对父亲的影响很大。开始爷爷让父亲去时意思是让他受革命实践的教育，但是父亲除了抗日宣传的实践工作外将自己空余的时间主要花在学习上，因此父亲是大家公认的书呆子，被大家称作“老夫子”。大家推他担任了孩子剧团图书馆的馆长，他把图书管理得井井有条，书也越来越多。什么文学艺术、历史、政治、哲学、自然科学，以及陕甘宁边区来的小册子，这些书成了团员们的好老师，打开了大家的眼界，丰富了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它像一把火炬，照亮了孩子们的幼小心灵，照亮了他们漫长而艰苦的人生路程。

参加孩子剧团的第二年，父亲就开始认识到在孩子剧团搞的革命工作有重要意义，对于剧团分配的工作总是积极认真地完成。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企图一举消灭抗日救亡的新四军。郭沫若被迫退出三厅，孩子剧团由冯乃超领导。虽然国民党千方



1939年孩子剧团在重庆进行抗日宣传，左1严良堃、右2尚嘉齐

百计地阻挠，抗日宣传工作陷于困境，孩子剧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方斗争，进行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父亲就将年纪较小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后来，孩子剧团加强了内部学习的工作，父亲被任命为剧团的学习部长，就更积极地投入了这一工作。1942年秋，由于形式所迫孩子剧团解散。1944年秋，他带着妹妹丁莉莉去昆明，找先期到达的父母，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

西南联大地处云南昆明，当时是我国西南地区有名的民主堡垒。在中共领导下，1944年校园内社团活动纷起。父亲上了西南联大先修班不久，就在同学中开展读革命书的活动，组织了读书会，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问题，带动先修班100多名同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由于父亲在孩子剧团就喜欢读书，政治理论水平较高，在读书会中起着思想指导的作用。读书会成员孙霭芬对社会上贫富悬殊乞丐遍地很同情，常给乞丐一点钱。父亲注意到后，就告诉她，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给点零钱不能解决问题，应当考虑整个社会的改造。对她思想的提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在西南联大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一、二支部相继成立。由地下党联大二支部负责人李凌发展，父亲成为第二支部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又发展了读书会的潘梁、田振邦、程法毅参加民青，组成了小组。民青二支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领导下，他们遵照党的指示、方针、政策，积极进行“勤业、勤学习、勤交友”，团结群众，服务群众，提高群众

觉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5年4月，联大学生会发表了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映全国人们愿望的“国是宣言”，提出停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父亲就和先修班几个同学联合发起了一个先修班学生拥护该宣言的签名书。此后他们还积极参加了1945年昆明纪念“五四”的多项活动、游行等，这些活动对参加者都是极好的锻炼和教育。加入“民青”是父亲学校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此后，父亲感到是有组织的一员了，就放心大胆地在组织领导下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组织要求的工作中去了。

先修班结业后的暑期里，父亲按组织安排去参加一个学生暑期夷区工作队，这个队是打着基督教青年会的招牌，开创发展革命势力的组织，成员大部分都是“民青”的盟员。这个暑期40天的工作使父亲更多地了解农民和少数民族的生活与疾苦，给了父亲不小的教育。

1945年秋，因为学习成绩优秀，父亲从西南联大先修班被保送入联大物理系。在“民青”第二支部里，父亲负责大学一



原西南联大读书会成员解放后留影。左2起：王汉斌、田振邦、周幼真、潘梁、尚嘉齐、周桂棠（沙叶）、程法毅（陈英）

年级及先修班“民青”组织的领导工作。年底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一”运动，父亲和其他联大同学一样，热情参与，并在运动里受了许多教育与锻炼，开始懂得了斗争中应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同时，在这一斗争中，也使党更清楚地考察了父亲。因此，在运动结束后，父亲就被列入党的发展对象。

1946年3月21日，父亲光荣地入党了，他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父亲把入党申请书交给入党介绍人李凌同志时激动地说：“党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了！”此后，父亲就更积极地投入到当时的反内战斗中。（预备期原定为一年，由于忠诚积极地工作，缩短为半年）到1946年9月21日转正。

1946年夏，联大复校回到北京，父亲被分入清华的物理系二年级。这时由于联大党内较老的骨干有的毕业了，过分暴露的疏散了，父亲在学校也担负了更加重要的工作。在离开昆明前，父亲已被吸收为“民青”联大第二支部的支委之一。到了清华后，父亲仍然是民青的领导骨干。1947年秋，从联大回到清华的党组织按上级指示成立了党总支，父亲担任总支委员，在工作中受到了更大的锻炼。

父亲在清华任党支部书记的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内战，党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被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的时期。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开展全面进攻，到共产党进行全面反攻，是从乌云压城到曙光重现的大转换时期，此期间清华学运波澜壮阔地开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展，父亲努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每当学生运动到来时，父亲总是奔波于学生们的寝室、课堂和食堂，向他们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并广泛地征求意见，做出党支部的决定。在1947年初“抗暴”运动时，最初消息传来群众情绪高涨，纷纷要求上级组织游行示威。他积极将群众要求反映给党支部，向上级请示后，不失时机地做出了游行的决定。在每次重大的游行和集会中，同学总能看见他穿梭于队伍的前前后后，听取群众的意见，将意见传达给组织，并将组织的决定传达给同学来贯彻，使同学的庞大队伍能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行动。抗暴游行时，国民党特务也纠集了不明真相的学生组织了所谓大学的游行队伍，提出另样口号企图破坏。在父亲的指挥下，同学们一会儿慢步前进，一会儿快步前进，一会儿又跑步前进，一个队伍像条活龙一样，使敌人不知所措。学生的队伍拉成锁链，插不进来，弄得特务组织的学生前跑后奔，疲惫不堪，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这种指挥，出面的是父亲，而决策的是黎智、王汉斌等地下学委领导同志，父亲仅是其中一个传令兵。这次运动是清华、北大复员后北平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它配合时局冲破了笼罩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教育和争取了各个阶层的人民，带动了全国学运的复苏，也为北平学生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他是“五二〇”游行和宣传队的积极组织者。清华大学宣传队可说是当时游行队伍中最大的宣传队，人数曾达三百多人，在西单宣传时，曾受到敌特鞭打，再到中学宣传时，也曾有同学被捕，但同学情绪反而激

昂，毫不畏惧。

父亲善于联系群众，常与群众交流思想，他平易近人，许多同学愿和他做知心朋友。他又是一个坚持原则、善于贯彻党的原则的干部。在学生运动中，在进步群众中出现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他总尽力用事实去说服人，如定“六二”为全国反内战日，要全国一致行动，实行罢课、罢工、罢市、罢教，举行示威游行。这活动原不是党组织提出的，而是一些人在“五二〇”运动高潮中提出，由学生会通过。党认识到这是少数激进分子，在学运高潮中提出的不合实际、脱离群众、急躁冒进的口号，但要改变这决定，要做很艰巨的说服教育工作。但他坚决地执行党的决定，从“民青”到“进步群众”，一个个地进行工作，并且推动党员、盟员，组织大多数同学分组讨论，把党的正确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对少数当时不能接受意见，甚至骂他右倾的同学，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热情地、耐心地向他们做解释。父亲认为运动中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从不因别人的过激语言发过火。直到解放后，讨论当时学运路线争论问题时，他一面坚持正确的原则观点，学运中必须坚持正确的策略与方法，防止急躁冒进，才能避免和防止受到损失，另一面又坚决认为这些提出急躁冒进口号的同学、同志是革命同志，只是思想一时有些片面偏激而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父亲一贯重视宣传马列主义，他明确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探索革命道路，是要通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参加革命实践。到清华后，他一方面推动大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时积极创造学

习理论的条件，创办了“一二·一”图书馆。图书馆可听新华社广播，可看《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有一般社会科学书籍、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进步文艺作品等。当北平军事调动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撤退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军调部留下一部分书籍运到清华，将其中能公开的部分充实了“一二·一”图书馆。还有一部分党内秘密刊物，不宜在公开场合出现的书籍，存在许京骥同志当时所在的土木实验室的仓库内，供党员使用。父亲深切了解青年人、知识分子对学习理论的热切要求，因此他对此工作一直抓得很紧。1947年上半年，还和潘梁筹钱办了西山书店，他请姚国安同志负责书店工作。这是清华园内第一家出售进步书籍的书店。书店成了团结和联系读者的阵地。他还秘密组织印发党的文件，帮助同志们提高政治政策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理论学习方面，清华被认为是小解放区，可得的材料如《整风文献》《联共党史》中共七大文件等，清华校园中大多同学均有机会研读，这就以革命思想教育了大批青年学生。

1947年冬，父亲被调到解放区一个短期训练班学习了6个星期。这个训练班是设在河北沧县，由荣高棠主持，专门训练来自蒋管区的党员干部。在这个训练班中，父亲学习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理论和阶级观点。

父亲自从参加“民青”，尤其是入党后，由于领导上很信任，成长很快，工作情绪始终是非常饱满的，没有任何思想问题，从不知道“闹情绪”是怎么回事，领导和同志们也常常称赞父亲纯朴、忠诚、老实、坦诚。

在清华这段时间，开始时，父亲是在物理系二年级学习，因为革命工作占去了大量时间，只好休学，到1947年秋，转入社会系一年级学习。总之，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父亲正式开始了他的以革命工作作为职业的人生阶段。

1948年7月，即在黎明的前夕，父亲奉组织命令到武汉做地下工作，到武汉四个月后就上了关系，由地下市委张文澄同志领导。他把清华、北大来的党员编在了一起，成立了一个青年工作组，清华的有父亲、杨坤泉、吕乃强、张昕若、尹宏、马履康、朱本仁、徐琤、刘佩云、史维灿、徐家晟、姚志学、李太平、王务新、曾玉基，燕京大学的有杨宗禹和北大的我们的母亲伍骅，由父亲担任书记。这对父亲来说也是个新的挑战。

青工组的成立，是市委直属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中的骨干都是抗日战争后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以及在平津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泼辣，勇于开拓，在学生运动中取得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这些经验正适合了武汉市形势的要求，加上市委的领导，发扬了他们的长处，克服了短处，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9年1月中旬，张文澄同志按地下市委的意见，召开了青工组第一次会议，领导大家认清了形势，部署了发展力量、迎接解放的任务。在这里开过了两三次会议后，张文澄同志特别提出：开会的地点不适合地下工作的要求（当时是母亲工作的育德女中宿舍），容易暴露。事实上当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时已有特务在盯梢，为此，以后开会迁至合作路一号新租房内。躲过敌人的注意，保证了同志们安全。

在清华南下党员初到武汉尚未与武汉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前，大家的职业一时也无法落实，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父亲联系了清华时发展的共产党员、清华同学戴宜生，动员他从资本家家庭中拿出其母亲的金条、银元、英镑等，无私地捐献给地下党作为活动经费，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大家分别找到生活来源，同时他们也接上党的关系。

还值得一提的是，青工组有力的战斗单位——两个秘密的印刷小组，分别设在汉口和武昌，这是我们的父亲和杨坤泉分工联系的工作。汉口印刷组张昕若、朱本仁、张皓若、叶伟才，及时地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党中央向人民解放军发出的向全国总进军命令等学习、宣传文件共40多种两万多份，通过基层组织的同志发往各处，帮助大家了解形势，了解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同时给敌对分子指明出路。

父亲和青工组的同志们都努力迅速开展工作，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热情空前提高。就在这七八个月的时间内他们不仅发展了共产党员63人，而且在零起点上建起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武汉总支部，而且把它发展到五六百人，普及到几乎各大、中学。此外，还用新民主主义建设者联盟这个组织的名义发展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业青年，又在教师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新教协）。这支力量无论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解放前夕，他们保护了学校、工厂和单

位，做了登记、造册，护厂、护校等工作，使接管工作进行顺利。他们团结了群众，形成了一只庞大的队伍迎来了亲人解放军。总之父亲不辱使命，与武汉地下党领导和各条战线的同志配合下，在迎接武汉解放的光荣任务中尽了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市委指挥下，完成了大量的、严密的联防工作。因此在国民党军队退出、解放军尚未进驻的真空阶段，武汉市社会秩序稳定，未发生任何重大意外事件。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地下市委为了交接工作的便利，就把青年工作组与另一学生工作组（也属地下市委领导的）合并成立学委会。合并后父亲担任了副书记。接着父亲就被调到团市委工作，担任党的市青委委员，任团市委常委、学生部副部长，同年9月，又提升为学生部部长。1950年初，成立学校团委，父亲担任第二书记。该年秋学校团委取消，父亲又做学生部部长，一直到1952年“三反”以后，父亲才离开学生部的工作，担任团市委宣传部长。1953年10月，父亲被调至团中南工委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

1954年10月大区撤销。父亲由中南工委调到团中央工作，担任学校部中学科科长。当时，胡耀邦同志任团中央书记，工作都还顺利，进入个人成长发展的最佳时机。

1958年“反右”后正临全国高校急缺“政治坚定”的干部，父亲毅然决然地服从组织安排调入吉林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来改名为吉林工业大学，后又与吉林大学合并）工作，先后担任团委书记、拖拉机系主任、无线电系总支书记，科研生产处长，校党委委员。

父亲到吉林工业大学以后，为学校建设、搞好教学科研工作呕心沥血。当时学校师资力量十分薄弱，父亲爱才如宝，无线电系只有一位教授，就是系主任吴存亚。吴教授刚好也是西南联大同学，他毕业后曾到英国留学，好学勤奋，精通英语和业务。父亲与吴教授二人同心同德，要把无线电系办好。他们共同研究教学的组织安排，凡是艰难的课程都由吴存亚去教授，同时也注意培养青年教师。有些教师业务能力很强，但过去因为所谓家庭出身、历史问题挨过整，思想有包袱，不敢放手干，父亲就和他们个别交谈，宣传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和科研中，父亲从不论资排辈，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大胆破格使用。系里很快打开局面，蒸蒸日上。但是，一些极左分子却说他右倾，“是牛鬼蛇神保护伞”。父亲和吴教授都知道，要保证教学质量，必须严格要求。一些学生考试不及格，极左分子就说父亲和吴教授是“迫害贫下中农子女”。

父亲一向与人为善，经常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和同志，他知道实习工厂王鲁其爱人没工作，长期生病在家里，就把自己看病的钱和子女的衣服送给他们家。当父亲知道范雅操老师住房困难，连忙把家里最大的一个房间腾出给他们住，我们全家五口只好挤在二十几平米的小套间里；父亲生活一向简朴，能够吃苦，热爱劳动，教育子女甚严，在困难时期带领我们吃榆钱儿、吃野菜树皮，后来生活好了，剩饭剩菜也要平均分着要我们吃掉。记得文革开始，我们被造反派赶到工人新村住的时候，住房

很简陋没有上下水道和厕所，也没有煤气、暖气。我们全家都觉得很习惯，可父亲说这是给我们劳动锻炼的好机会，他与我们一起从砌煤炉、掏烟道学起，然后是挑水、劈柴、生炉子、借板车买煤。他说这样才能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父亲在困难时期，连续几个月把整月的工资交党费，一次在自由市场买了猪肉，在党组织生活会上，反复检讨。这些都可见父亲对党始终忠贞不渝。

1964年6月，父亲调到吉林工大科研生产处任处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是探讨未知的事业，必须具有创新精神，父亲对创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非常支持，也很有兴趣，所以吉林工大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以连杆辊锻工艺课题为例：内燃机的连杆一般用模锻的方法生产，需要大的压机，一般厂家没有大型设备，生产不了。吉林工大机械系的教师提出用辊锻的工艺方法来加工连杆，而提出和负责这个课题的，是一些青年教师，父亲积极支持，在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经费保证，使项目进展很快，急国家之所急，研究以新的工艺方法制造195型柴油机连杆，受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为了支持机械系的“连杆辊锻”攻关项目，父亲联系地下党时期的老领导，武汉市主管科技的市长黎智同志。黎智市长亲自将试验项目安排在武汉市柴油机厂。该厂高度重视，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与教师学生，共同进行实验，研发成功，解决了生产一大难题。通过这个项目，学校建立了辊锻研究所，还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教师。

1965年，父亲根据自己长期学习马列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主义的体会给校党委写信，对当时“学毛著”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出意见，并认为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扣上“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一再受到批判斗争。父亲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坚持自己的看法。

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父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

在“文革”浩劫中的1968年8月，由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派出工、军宣队进驻吉林工大。不久，即宣称工大是“特务的大本营”，揪出特务200多人。工、军宣队将教学设备无线电台诬为父亲与敌特组织联系的工具，对父亲进行毒刑拷打；要他跪在桌子上，两手举着沉重的大牌子，后面有人用大木棍打他的脚踝骨，使他疼痛难忍；晚上还有工、军宣队的人逼他“交待罪行”，继续拷打，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后来，工、军宣队宣布他于1968年10月5日上午死去，说是“畏罪自杀”。

在这期间父亲用写交代材料的机会，以他真挚而单纯的想法，向党组织写了份长篇的思想汇报材料，工、军宣队的负责人反而借此材料变本加厉向他施压，并拼凑了一份所谓遗书的抄件，最后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责，将原件秘密销毁，声称丢失了。因此，父亲的死因至今不明。

父亲死后，工、军宣队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父亲的死，是特务组织“杀人灭口”，并进一步把逼死他的罪责嫁祸到母亲和在家帮助照顾家务的伯母

王瑞华身上，把母亲关押起来，并抄了我们的家。不久，他们又以校革委会名义做出决议，正式给已去世的父亲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诬蔑他“一贯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破坏大联合”“挑动群众斗群众，罪行累累，以畏罪自杀抗拒群众的审查”，因此开除出党。并演出了在校园里用父亲衣服扎成草人进行批斗的一场闹剧。

当天夜晚，工、军宣队在我家周围布上了岗哨，大门被贴上侮辱人格的标语对联，对我们进行划清界线的政治攻势。有时半夜冲入家门随时进行询问。很快父母工资被冻结，姐姐下放，我们两个小的守着空房，因为没钱买煤，不能生火取暖，我们就得了肺炎，手脚生了冻疮流了脓。

之后，母亲和我们仍继续受牵连迫害，全家被赶到怀德县插队。但我们不屈不挠，抓紧一切机会，向党中央、向各级党组织申诉，要求把父亲的问题调查清楚，为他平反昭雪，并追查杀害父亲的幕后主使人，将其绳之以法。

一直等了十年，到1978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才等到一个以所谓“尚嘉齐专案组”名义写的《关于尚嘉齐同志冤案的调查报告》，承认这是一个冤案，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我们的父亲在死后没多久，几乎衣不遮体地被他们扔上敞篷卡车拖向了火葬场，没让我们见最后一面，骨灰也没有留下。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他在申请入党时的誓言：“党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了！”父亲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他的夙愿，并以自己的献身引起了我们后代无限的深思。